

古城往事

补面袋和麻袋

梁建军

布面袋对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,但在30多年前,面袋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买面装具。那时的面袋由白布制作,重复使用,面袋挂破磨损开线,就要织补,补好继续使用。

大面粉厂都有器材科,有几十号人专门缝补面袋和麻袋。父亲所在的粮库有个面粉车间,由于产量不大,面袋和麻袋由家属或临时工缝补。那时的家属大多都是从农村来的,没有正式工作,家属们补面袋也能挣钱补贴家用。缝补面袋、麻袋按条数计件付酬,对时间场所也没有要求,大家都把面袋、麻袋拉回家里补。父亲一次要拉满满一平车面袋,有近千条,妈妈补好后,送回去再拉破面袋。

补面袋是非常辛苦的,妈妈每天吃了早饭就开始缝补面袋,吃了中午饭,顾不上午休。妈妈出手慢,光怕落在别人后面,晚上熬夜补到十一二点才休息。一天能补七八十条,补一条挣2分钱,一个月下来能收入四五十元。

补面袋还有两个福利,一个就是赚补丁。补丁是包干的,补100条面袋,发101条,其中一条做补丁,节约归己。补丁面袋要挑最破的,破口小的面袋既好补还会省补丁布。由于补丁是“量体裁衣”“才尽其用”,妈妈补面袋补得多了,就节余了不少补丁面袋。那些面袋拆开洗干净,可以用来

做被里子、鞋里子、衣服里面的衬布,还能省些布票。

再一个福利就是能抖些土面。面袋拉回来,在缝补以前,爸爸要把面袋抖一遍。把一个瓷碗放入面袋底下,碗口朝上,抓住面口袋两边,上下抖,把面袋上粘的面抖落到碗中。通过抖面,把附在面袋表面的面和土抖干净,补面袋时面袋上的土就少了。更重要的是把面袋里的面抖落收集起来,面里含砂量不大的,就能蒸馒头吃了,虽然有些牙碜,但比窝头好吃多了。含砂量太大,或是红面袋子里抖出来的,就留下喂鸡或做浆糊,做鞋面裕褙子用。

天气暖和时,补面袋一般就在家里的后院里。天气一冷,就只能在家里缝补,柜子上一会儿就是一层土。院里十来户都在做补面袋的工作,孩子们也都是十来岁,我们就比赛减轻妈妈们的负担,看谁会做家务。那时,我们放学后就学着熬稀饭、洗锅,打扫家,有时孩子们还会相互参观或炫耀一下,看谁把家打扫得干净。我做家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,也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。

1998年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意识的增强,太原市开始推广一次性编织袋装面,重复使用的布面袋就退出了市场,补面袋的工作也就消失了。

岁月留痕

远去的风筝

晓根

一日,我正在小区走路锻炼,忽见小区南面的天空上飘着一只别样的风筝。之所以说它别样,是因为在众多的风筝里,这是一只现在很难见到、手工制作的、最简单的老式风筝。它只有一个方形的脑袋和两条长长的尾巴,与那些花花绿绿、有着各种造型的风筝相比,虽显得简陋、土气,但却给人一种久远的亲切感,一时间脑海里思绪翻飞,竟勾起了我对儿时放风筝的无限回忆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,每年春天都是要和小伙伴们去放风筝的。当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春天到来的时候,放风筝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游戏之一,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跑到村外广阔的田野里去放风筝了。

童年的故乡,天高、风清、云淡。于是在村口麦子刚刚返青的田野里、在拾掇粮食的场儿里,满天的燕雀与风筝,似在竞相比高。一只只风筝像是开在空中一朵朵漂亮的花儿,更像是泼墨在空中形成的一幅幅斑斓色彩的图画,令人赏心悦目,驻足凝望。那种天上满天风筝、地下满地孩童的景象,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而每一次风筝的放飞,身后总是有几个小伙伴欢呼雀跃地跟随着奔跑,那

份快乐的心情简直比过年放炮还高兴。特别是放飞的时候,眺望摇曳在万里晴空的风筝,那份专注、欣慰、恬静,使人荣辱皆忘,杂念俱无,那是一种对自己心情的尽情释放,是把心情像风筝一样放飞到广阔天空去自由飞翔的怡然和感动。

当然,也有懊悔的时候。一次,由于风向突变,我那刚刚升空的风筝一下子被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之上,我手里攥着崩断的棉线,望着可望而不得的风筝,无助地放声大哭起来。直至今日,每当看到空中飞翔的风筝,我仍会想起那只挂在树梢上的风筝……

作家席慕容说过:“走得最急的总是最美的时光。”美好的童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只是刹那的璀璨,仿佛嘴里的那颗糖果还没有含化,就忽然长大了。长大的日子里我常常独坐一隅,怀念远去的生命之初,还有童年时代那份纯真和无忧无虑。尤其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几十年里,那个在旷野里拽着风筝奔跑的顽童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往事钩沉

孙谦当年有多火

韩石山

中国的成年人,怕没有没看过春晚的。说起春节晚会这个话题,作为对比,有的人还会提起1956年的那个《春节大联欢》,且尊之为新中国的第一场春晚。我是在疫情期间,在电脑上闲翻,才看到这个旧视频的。看了之后,才知道孙谦先生当年有多火。

联欢会开始后,主持人郭振清说,今晚光临的嘉宾有劳动模范、战斗英雄、著名作家。真要具体介绍了,先说的是著名作家,共六位,原话是:每天上午坚持写作三个小时的老舍先生,老作家巴金先生,《暴风骤雨》的作者周立波同志,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杜鹏程同志,电影编剧孙谦同志,《万水千山》的作者陈其通同志。

这是他手指嘴说的人名,实际的位置颇有讲究。

会场上大概有十几张圆桌,他左侧的圆桌上坐的是著名作家,正对着镜头的有三位,巴金居中,一边(巴金右)是老舍,一边(巴金左)是孙谦。巴金身后并排站着的是周立波和杜鹏程,圆桌这边,只能看到背身的是陈其通。也就是说,老舍、巴金和孙谦,坐的是主桌的正位,另外三位,或站立背后或坐在侧位。还有一个区别,有人可能没注意到,就是,正位上的三位作家都只说职称,不说作品,另外三位分别说了代表性作品。

或许有人会说,孙谦年龄大吧,不是的,周立波1908年生,陈其通1916年生,杜鹏程1921年生,孙谦1920年生,只比杜鹏程大一岁。

我知道我的这位师长级的老同事,是文艺二级,在省作协院里薪金是最高的,解放初期颇有声名,却没想到,会显赫到如此地步。

在山西,我们都是把他当小说作家看的,怎么这里会说他是电影编剧呢?

这就要说到他早年的经历与业绩。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,最早是在东北打响的,长春攻下后,派去接收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中,有进步的电影从业者,也有解放区来的文化工作者。孙谦就是后一种人中的一员,他是晋绥边区派到东北去的。原先写小说,到了电影制片厂,就顺理成章地写了剧本,上映的有《葡萄熟了的时候》等多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文化部创办北京电影制片厂,又调他到了北影,也写了好几部电影。有此经历与业绩,也就有了电影编剧的头衔。

实际上,他一直是小说作家,比如他最有名的电影《伤疤的故事》,就是先写成小说,后拍成电影的。

一个小说作家,在这样隆重的聚会上,竟与巴金、老舍一起坐在主桌的正位上。在我看来,不是凭了他电影编剧的身份,还是凭了他小说的巨大影响。为了写一篇文章,我从网上购了孙老师早年的几本小说,看看这些小说的出版与发行,就知道他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声望了。

共三种,分别是《夏天的故事》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和《伤疤的故事》。

《夏天的故事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北京第1版,1955年北京第1次印刷,85000册;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,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年5月第1版,1957年1月第3次印刷,83000册;《伤疤的故事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,1959年8月第2次印刷,23005册。

再看字数,《夏天的故事》8.5万字,算个中篇小说;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,2.7万字,也算个中篇小说;《伤疤的故事》,11万字,是个集子,收小说散文共11篇。

孙谦的小说,著名的有三篇,都在这个集子里,分别是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《有这样一个女人》和《伤疤的故事》。最著名的,该是《伤疤的故事》这个两万字的短篇小说。发表后很快拍成电影,全国放映,改革开放后,太原还放映过。我就是那时看的。有这样的小说和电影,可以说,当年的老作家里,论当时(注意,是说当时)作品的影响,还要数他最大。

伤疤的故事